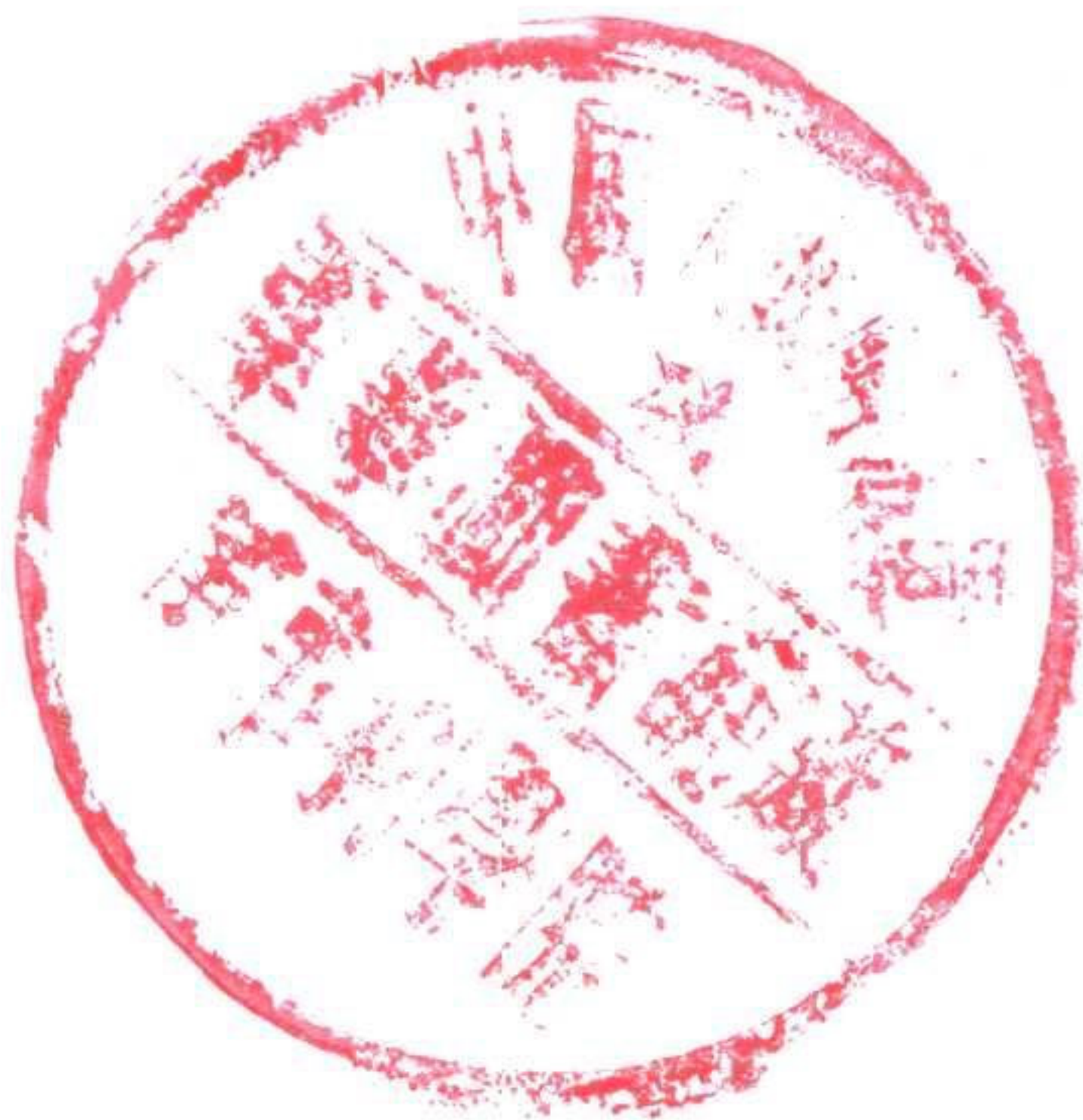




周銮书文集◎军事卷

兵略 兵制 兵争

周銮书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序 一

王 淇

周銮书教授所著《兵略·兵制·兵争》一书，是他学术生涯辛勤耕耘的一部分重要成果。这本书大部分为研究性论文，内容丰富，闪光点颇多，不乏真知灼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各篇逻辑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文笔流畅，虽为学术著作，但可读性强。由于书中有些论文我过去看过，作者希望我为他的兵论文集写一篇序。然而撰写正规的序言，实非易事。变通的办法，是谈点读后的感想以代之。

首先，读了这部著作，觉得作者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研究方面，确实化费了大量心血。书中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以及根据唯物辩证法而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同时，阐明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由于作者理论根底深厚，所以对许多战例（兵争）的分析研究，立足点高，总揽全局，在剖析重点、难点问题时，显得游刃有余。《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就是以此获得佳评。书中关于中国兵制史的研

究，扩充了一般通史著作的历史容量，阐发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朝代更替的某些内在规律，我读了之后，历史画面的立体感顿时增强。例如，看完《宋代养兵政策剖析》，掩卷冥思，南宋诗人朱敦儒在《相见欢》词中叙说的中原丧乱的悲怆情景，立即浮现在脑际：“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休？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宋代养兵最多，而不能自保。原因何在？当时的朱敦儒只会流泪，而不知丧乱何时了结。我们现在即可以做出科学的回答。所有这些，我相信对中青年读者朋友了解中国历史，会大有裨益。

其次，我认为，对当今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要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估计。人们说，现在是和平时期，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当今世界虽然总体上形势趋向缓和，但天下还很不太平，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军事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消极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也不可忽视。”〔1〕因此，“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古训，值得记取。在这种形势下，出版《兵略·兵制·兵争》这种纵论兵机的书，绝不是多余的，它恰好为现实所必需，完全符合党和国家大力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2〕的精神。“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国防教育

法》规定，各级学校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或设置专门的国防教育课程，并将课堂教学同少年军校活动或军事训练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少年军校活动开展很不普遍，学校的国防教育也较薄弱。在青少年人群中，要扭转不重视学习和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和技能的风气。自古英雄出少年，“崇文尚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最后，还想要说的是，作者在《自序》中议及的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军事技术高度发展的形势下，古代与近代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的价值问题。我同意作者的观点。我感到研究学习前人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及战略战术原则，要解决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好的榜样。毛泽东酷爱读书学习，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外，他非常重视、也非常喜欢研读中外历史和战争史，并善于从前人治国经武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他常惋惜接触《孙子兵法》原文晚了些；他在延安时期听范文澜讲中国历史、听何思敬译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做笔记的虚心学习故事，早已传为佳话。然而，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而应用必须切合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出和实践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创造性的运用和新的发展。同样，他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为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军事科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作者在《概述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文中告诉我们，人民战争绝不是什么“人海战术”（国民党将领曾经这样说），它的本质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因而作战依靠人民并将得到人民群众自觉的拥护，战争的成果归属于人民（人民革命战争胜利之日，即是广大被压迫人民解放之时）。这是人民战争巨大的潜在威力所在，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军事上的充分体现。至于以我为主、灵活机动的积极防御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则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上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打仗，从来不拘一格。犹如武侠小说中描写的武林高手，“以无招胜有招”。他总是根据人民革命战争发展进程中敌我双方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在战略战术应用上，不断变换和创新。归结起来，实事求是，人民战争，以我为主，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这些是有长远普遍指导意义的，即使在现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仍然是我们反对外来侵略战争、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传家之宝。

当然，也需要说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发展的。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进步，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其威力远非昔日可比，以至战争的时空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抱住某些传统的战略战术观念不放，更不能以死记过去某个年代的某些战例为能事。在新历史时期，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在继承优良革命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新的思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我国的军队建

设，要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走精兵之路，注重质量建设，实行以法治军和科技强军，建立起一支能够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精兵劲旅；同时，根据“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寓军于民、以民养军”的精神，联系新的实际，实行新的创造，以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潜在力量。我国的国防建设应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尤其要把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提到战略高度来对待，这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一环。

我坚信：一个拥有近十三亿人口、疆域辽阔、团结自强的民族，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独特的贡献。

2001年8月16日

注：

〔1〕国防部长迟浩田答解放军记者时的讲话。见2001年5月10日《解放军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序 二

邵 鸿 赵 明

继周奎书先生的《天光云影》文选问世之后，他的军事论文集《兵略·兵制·兵争》又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作为奎书先生的弟子，首先应该向先生表示热烈祝贺，当然也很乐意借此机会，再次向读者介绍他在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同时，使学人对江西史学界开展军事史研究的背景略知一二。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他对军事的兴趣，可能起始于幼年对军事历史小说的喜好，然而，真正走上研究的道路，则是受了谷霁光先生的引导。谷霁光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兵制史和经济史专家。谷老30年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受业于陈寅恪先生，毕业后，又留校担任过雷海宗先生的助教，受到陈寅恪、雷海宗先生史学思想的熏陶，对其后来的治学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雷海宗先生的史学思想在30年代还是属于比较新颖的一派，直接继承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1934年，英国史豪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

斯氏的理论，出版了历史学巨著《历史研究》，至今在学术界仍颇享盛名。而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张荫麟在吴宓主编的《学衡》上发表了长篇译作《施本格勒的文化观》（施本格勒即斯宾格勒），介绍“文化形态史观”。与此同时，雷海宗先生则在《清华学报》、清华《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运用这一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系列论文。其中以《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为其代表之作。1938年雷海宗先生在西南联大将这些文章重新整理编成集子，题名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雷海宗先生的治学路子中，他首先是以中国的“兵”为研究主线。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关键就是一个“兵”的问题。“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因此，秦以下“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无兵的文化》）可见，雷海宗先生所谓的“兵”，实际上是指国民或公民的权利。自秦朝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以后，上古时代的“民主”，无论从实质还是形式上都已经消亡殆尽，文化形态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兵”的文化层面来探讨“兵的精神”及其演变，“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中国的兵》）。雷海宗先生关于“兵”的文化学说，在

1949年以后当然都属于史学界的“白旗”，理应在被拔之列，何况作者还被诬为“战国策派”并被打成“右派”，予以批判，很快便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了。

由于谷霁光先生曾为雷海宗先生助教，在30年代中期即写下《补 魏书 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等著名古代兵制史的论著，就绝非偶然。当时正是他在清华给雷海宗先生充当助手的时期。当然，谷先生的兵制史研究主要还是用陈寅恪先生推崇和实践的考据学的方法进行的，但是涉及“兵”的课题，其中又带有雷海宗先生研究领域的痕迹，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解放以后，谷先生跟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专业上，他更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由于他有比较扎实的考据学功底，熟悉史料，加上正确理论的指导，很快就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他60年代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释》，被认为是兵制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考据学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军事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产物，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正是在谷霁光先生开辟的这种新型兵制史研究中，江西史学界才逐渐形成了军事历史研究的传统，影响了一批江西的史学工作者投入到军事史的研究中。

近十余年来，江西史学界开展了多方面的军事史的研究工作。原江西大学在80年代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兵制史研究所，周奎书先生出任第一任所长，并和江西师范大学的一些学者共同承担完成了原国家教委的中

国兵制史研究课题，发表了一系列军事史的成果。除了谷老原有关于隋唐兵制的著述之外，在先秦、秦汉、宋辽金及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军事史方面，也有了不可少的可喜的进展。周銮书先生长期担任谷老的助手，为倡导和推动江西史学界军事历史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繁重的党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之余，写下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古代、近现代军事历史的学术论著。这本集子便是他从事军事研究所取得成果的一个缩影。

这部集子的大部分文章，我们过去都拜读过。有的文章在写好以后，銮书先生就曾先给我们征求意见，有的是他指导中国兵制史研究生时的讲授提纲，这些课程我们都曾聆听，今天重新读来，又倍感亲切。现在，将这些论著集中在一起出版，更反映出作者在军事研究方面的一些治学特色。

首先，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研究，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军事历史，同时，军事史也是一门历史学与军事学交叉的学科，所以又要结合军事理论的研究。记得在80年代初，銮书先生就利用到北京开会之际，购买了由军事科学院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领袖人物的军事文选，当时这些著作还不是公开发行，社会上还不易买到，銮书先生如获至宝，认真学习研究，很快就写出了《试论恩格斯军事思想》和《简论恩格斯作战理论》两篇军事理论文章。这两篇论文是学术界在拨乱反正以后，较

早进行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的成果之一，也是不多见的军外学者专门研究军事理论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很注意将中国的传统军事文化、西方的古典军事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加以对照，结合有关军事历史事件，对恩格斯的许多著名军事论断，作出了科学的评析。文章在当时就受到军事科学院有关专家和领导的关注。再看文集集中的《概述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文，虽然只是50年代给本科生授课讲稿的一部分，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奎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早就情有独钟、孜孜以求，而且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理论熏陶，所以，在他的其他各篇军事史的文章里，无论是讨论古代军事还是分析近现代军事，都能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在充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上的军事现象进行辩证的分析。他特别重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伟大意义及作用，认为这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主要法宝，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决不要被唯武器论所吓倒，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就一定可以打败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其次，奎书先生写文章往往高屋建瓴，大多从微观入手，从宏观着眼，故论断常具有战略思维，善抓根本，新意迭出。其军事论著更是体现了这一特色。《宋代养兵政策剖析》、《评曾国藩的理学治军》、《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等军事史的论文，从题目上来说，讨论的都是某一个

历史时期的具体问题。但是，从论述的内容来说，都是当时军事领域对社会历史有着重大关系的课题。讨论宋代的养兵政策，说明了宋政权的综合国力和士兵的社会地位。评论曾国藩的理学治军，抓住封建军队建设中的核心，揭示了近代湘军等武装骤盛骤衰的基本原因。对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也是紧密联系北伐时期的全局态势，辩证地评价了北伐江西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些文章跨度很大，涉及了军事和国防经济、军事制度、军队建设和战争战略等诸多问题，可见作者有很深的学问功底，不但学通古今，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还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善于驾驭史料，故下笔有神，游刃有余，读后令人感佩。

其三，对论著反复推敲，再三修改，是銛书先生治学的一个良好习惯，体现了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学风。銛书先生是在谷老直接培养下走上学术道路的，也直接继承了谷老的严谨学风。他多次满怀深情地向我们回忆起谷老教他如何写文章、改文章的情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本书的作者《自序》中，他将平时跟我们所谈的话形诸文字，意在对他恩师谷霁光先生的缅怀，实际上更是对我们后学的鞭策和激励。几十年来，銛书先生始终按照谷老的要求治学，文章不改到满意，决不轻易付梓。如《宋代养兵政策剖析》一文，还是他在原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时，根据谷老的要求写下的初稿，不久，他就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时间特别紧张，又受

研究条件所限，断断续续地和学生、朋友讨论修改过几次，始终不能满意，便一直搁置起来。到他正式退休之后，才抱病改成定稿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校庆60周年纪念刊号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写作前后竟经历了18年，期间经过了多少次的琢磨、锤炼，花费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和无数的心血，则是可想而知的。严谨和勤奋是密不可分的。奎书先生牢记谷老“八小时之外，奋斗终身”名言，在十余年的领导岗位上，硬是挤时间写下了大量学术论著，完成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退休以后，每日仍伏案笔耕不已。像谷老一样，奎书先生也是将辛勤的学术工作当成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甚至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对事业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是他作为一名学者能够在自己钟爱的领域中取得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部集子中有一些文章是作者与其他先生合作而成，还有一些谷老的学术言论笔记，这些都是经奎书先生反复修改、整理和审定后出版的，有的是他重新写作再共同讨论修订发表的。所有这些文章，在某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固有可商榷完善之处，但主要是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扎实勤奋的精神，值的我们认真学习，也愿意推荐给广大读者，是为序。

2001年2月22日

自序

我拿这些稿子合在一起发表，有的朋友可能会笑，一介书生，三门干部，奢议军事，岂非纸上谈兵。其实，我过去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在1984年协助谷霁光先生带中国兵制史研究生以后，才产生这种念头。可那时杂务缠身，力不从心，原来准备要探讨的一些课题，也就停停打打，虽然于心不甘，但现实比人强，不能不拖了下来。一晃十几年，而今日大病之后，已属老弱病残，要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自度已无多少可能，岁月已逝，面对残篇剩稿，弃之可惜，勉力将其积集，一则向亲朋交代，过去做了些什么，敬请批评指正；一则表示已无力再钻研下去，犹如向军事领域挂起“免战牌”。

对军事感兴趣，可能起始于年幼时候喜欢看打仗的小说，大概在小学三年级，一位村上的小哥哥给我看《说岳全传》，被书中众多的英雄人物和激烈的战斗场面所吸引，随后又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英烈传》、《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榜》、《西游记》等，更加让我入迷，以至只要是打仗的小说，无论古今中外，只要能够借到、找到，全都弄来看。没有小说看，闲得无聊，就拿一

根木棍在堂屋里乱舞，或到菜园中横扫野草和树枝，以示敌人被我荡平，自许为岳飞、武松，或者赵子龙，满脑子都是“有万夫不当之勇，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夫当关，万夫莫入”，或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之类的话头。母亲说我着魔了，不准我看小说。不能在家里看，只得在去学校的路上边走边看，黄昏时，母亲煮饭，就躲到菜园子里去看，我的近视眼和走路老低头，竟是这样养成的。少年时这样迷恋打仗的小说，逐渐产生长大了一定要去当兵的念头。而且，我出生的年代，正是军阀混战、红军革命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加上我前面还有哥哥，我父亲就常常说，将来总是要被抽壮丁的，练练武有好处，还准备请邻村的武师来教我们，不幸父亲在1941年去世，那年我八岁，武没有学成。母亲迷信，还去给我算八字，瞎子先生竟说我是当兵的命。何况我很喜欢打仗，更以为当兵真是命中注定。

八年抗日战争后期，我正读小学，没有能赶上抵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读中学，国民党各处抓壮丁，我很瘦弱，又不到年龄，没有被抓上前线，也没有被捉去台湾。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十七岁，在南昌大学历史专业读一年级，同当时许多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的同学一样，也满腔热情地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医院检查，发现有胃溃疡和肠炎，被取消了资格。我从少年时候起逐渐产生的“投笔从戎”“以马革裹尸归来”的梦想，就这样地幻灭了。

当兵不成，并没有打消我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和偏爱。帝国主义还在，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欺侮了中国一百多年，他们何时肯罢休呢？我学的是历史专业，既然不能当兵打仗，不能从实战中经受锻炼，去夺取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研究战争，总结前人的经验，帮助后人去夺取胜利呢！因此，我在南昌大学历史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班学习、研究期间，只要涉及军事内容，就不惜花费精力去阅读有关战争的理论、制度、实例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这的确使我眼界大开，一部《孙子》，就让我终身受用，更不用说恩格斯、毛泽东那些永放光芒的军事学说和思想所给予的启示和教诲，这同少年时从小说中接受的那些感性的战争故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

的确有点“无巧不成书”，我大学提前毕业后，于1953年秋在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被分配给谷霁光先生做助教，那年我二十岁。谷霁光先生是中国兵制史专家，他在二十八岁时撰写的《补魏书兵制》、《唐折冲府考校补》两篇文章，载入《二十五史补编》而受到史学界瞩目，60年代初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释》一书，更为国内外史学界普遍重视。我在做他三年《中国通史》课程助教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两年，返校后，他已调离江西师范学院，先到省教育厅，后到江西大学，我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做他的助手。他因主要研究中国兵制史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所以，我学习与研究的范围，也往往以他为

转移或按照他的意见安排。我追随他学习军事制度史的过程，从历史阶段看，除通史外，学习的重点是先明代，再宋代，后清代。乍看顺序有点错乱，其意图则是从简单到复杂，同时也与我的教学相结合。从探讨内容看，他提出从理论到兵制到战例的次序，他认为这样更合理，更易发现和解决问题。为了深入学习，掌握规律，不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必须沉下去，研究一些重点、难点课题，力求以点带面，融会贯通。开始时，他为了督导我，以至每晚陪我读书，七时半他就来了，十时半才离去，天天如此。他对《明史》和有关古籍，从标点、分段教起，告诉我怎么看原始材料，怎样分析、鉴别原始材料，强调看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这种陪读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每写一篇稿子他都仔细批阅，达不到一定的要求，必须重写。他对每篇重写稿都反复提出修改意见，修改最多的一篇《秦桧是怎样变成民族叛徒的》竟达14次之多，最少的稿子也得修改二三次。惟一没有修改的是为他写的《谷霁光史学论文集》序，算是一次成稿，事后我想，大概因为是对他的著作和治学评介，他不便提出意见。从1953年秋至1993年春，谷霁光先生离我们而去，前后40年，其间虽经历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向贫下中农学习4年，还有我担负的教学、行政和社会工作占去了许多的时间，但稍有空闲，他就向我提出需要探讨的课题，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到来，而我已过不惑之年，他更是经常向我敲警钟，说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你也不小了，要抓